

# 略论毛奇龄的史学精神与治史之风

张 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上海 200062)

**摘 要:** 明末清初备受争议的著名学者毛奇龄, 以经学研究闻名于世, 同时对史学研究也相当重视。他参与《明史》编修, 为后世留下丰富的史著; 他重视史料的考据与辨伪, 体现了史家“求真”的史学精神; 此外, 他反对宋儒“史断”、批驳道学, 有功于清初“弃虚蹈实”的治史之风开启。因而, 毛奇龄在清代史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 毛奇龄; 清初史学; 史学精神; 史学风气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7)06-0038-06

毛奇龄(1623年-1716年)生于明天启三年, 卒于清康熙五十五年<sup>①</sup>, 一名甞, 字大可, 学者称西河先生或河右先生, 浙江萧山人, 清初著名学者。其所学淹博, 著述丰赡, 有《西河合集》, 分经集、文集两部约五百卷留存于世。毛氏以经学自负, 研经考礼, 独树一帜, 成就斐然, 堪称明清易代之际一代经学大师。虽然毛氏一生致力于考订六经的经世大业, 但其并未忽视其它学术, 对文学、乐学、史学等也多有研究。毛氏一生九十四个春秋, 经历了从文士到史官, 从史官再到经师的转变, 在尚未成经师之前, 其对读史、修史、考史, 情有独钟。在明清易代学风大转轨的背景下, 毛氏既对清初史学的发展有大贡献, 同时其史学研究也折射出明清鼎革之际那个特殊时代的历史气息。

## 一、治史经历与史学成就

毛奇龄“少读经, 稍长读史”<sup>[1](P1169)</sup>, 明亡之后避入山中土室“聚南、北、唐、五代、辽、金、元史暨诸书其中纵观之”<sup>[1](P1165)</sup>。毛氏早期潜心读史的这段经历为其以后参与编修明史, 考研经史备下了良好的基垫。

清初史学建设中首屈一指的大事当属纂修《明史》。清初, 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巩固统治确立正统之位, 顺治二年(1645年), 清世祖命内三院大学士刚林、祁充格、范文程等为总裁, 开馆纂修《明史》, 然清廷入关伊始, 头绪甚多, 史才与史料皆缺乏, 修史作为甚微。康熙十七年(1678年)天下方定, 清圣祖下诏复开明史馆, 特设博学鸿词科, 令各省举荐人才。毛氏被荐上书三辞未果, 被迫入京应试, 翌年中试, 列二等, 授翰林院检讨之职, 入东华门史馆纂修《明史》,

收稿日期: 2007-03-21

作者简介: 张贺(1978-), 男, 吉林白城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学术史与传统文化

① 学界普遍认可毛奇龄卒于1716年, 然而陈祖武先生认为毛氏卒于1713年, 参见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282页。此外, 台湾林庆彰先生也有不同的看法, 认为毛氏卒于1709年, 参见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 第55页。

从此开始以史官身份肩负起不忘故国，考订“信史”的责任。作为重要的《明史》纂修官之一的毛奇龄同其他鸿儒学人等一道尽心竭力编纂故国史稿，开启了清初史学建设的黄金时期。毛氏在其所著《史馆兴辍录》中，详细记述了当日鸿儒们初入史馆专修《明史》的盛况<sup>[1](P1366)</sup>：

史官五日一到馆，领题归寓，不过值馆日缴文而已。但本朝原无史馆，诸史官亦并无纂修事，兹专为纂修明史而设，抵其仪注有不可考者。自上开制科，以予辈五十人充明史馆官。其到任日，监修、总裁诸史官只一揖。监修总裁负北腕南面，铺垫登土炕坐，诸史官以次登炕，接总裁南面，东西环坐，东环者转而西面，至门止，西环者转而东面又转而北面，亦至门止，全无比肩抗颜之嫌。其收掌司录中皆主事，并不上堂参揖；而监修系满汉中堂，凡侍立者皆内阁中书，多进士出身，与诸史官亦并不一肃手。

毛氏在明史馆七年，堪负修史重任，不辞辛劳，本纪、列传无不涉及，共起草了明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四朝的《后妃列传》，又另作《土司传》、《盗贼传》，以及弘正二朝纪传及诸杂传大小二百余篇。此外初入史馆时作为阳明同乡、王学后人的毛氏曾著《王文成传本》。后来同为史官的尤侗拈得王阳明传，则毛氏之稿备为尤氏之不可多得的参考材料。毛氏在史馆“自启祯以前，凡草本无不一一完缴”，所作后汇成《明史拟稿》为后世《明史》最终定稿提供了重要蓝本。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毛氏携修史余稿寻假归乡，继续著史。写成记有明一代盗贼之事的《后鉴录》七卷、反映明代土司始末的《蛮司合志》十五卷、叙述明代后妃的《胜朝彤史拾遗记》六卷、晚年又将《王文成传本》重新修订。毛氏史著甚丰，除以上提及者，又有《史馆兴辍录》、《武宗外纪》一卷、《制科杂录》一卷、《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兼刑部尚书易斋冯公年谱》一卷、《萧山县志刊误》三卷、《湘湖水利志》三卷、以及明代诸多人物传记八卷和《列朝备传》四卷等，皆编入《西河文集》。此外，另著有《史问》，因毛氏有遗命而未付剞劂。至此，毛氏史学著述可见大端。

## 二、“核实求真”的史学精神

毛奇龄治史贵在核实求真，不仅勤勉谨慎认真而且必“藉实据”。诚如当代史家杜维运所言：毛氏治学重考辨之精神，其发挥及于史学，为注重史料之蒐集，注重史事之审订<sup>[2](P266)</sup>。其一，毛氏重史料的收搜集与整理。毛氏除了向同乡广征本乡明代名人的行状记事外，还向明代遗民名士恳求史料与史著。诸如其曾寄信给避居的遗民名士张岱，索求他的明史著作，以作修史的蓝本，《寄张岱乞藏书》云<sup>[1](P181)</sup>：

向闻先生著作之余，历经三百年事迹，饶有卷帙，即监国一时，亦多笔札……今总裁竟以是纪分属某班，旋令起草，此正淳典殷献之时也。不揣鄙陋，欲恳先生门下，慨发所著，汇何姜京兆宅，抄录史馆，以成史书……若其中忌讳，一概不禁，只将本朝称谓，一易便了。至其事则正无可顾也。且史成呈进，当详列诸书所目，不敢蔑沫。

观此书札足可见毛氏对搜集史料之重视，治史态度之恳切。清初明史料繁杂广博，实录、野史，私修之史，私家藏书比比皆是。梁任公认为“治明史者常厌野史之多，治清史者常厌野史之少”<sup>[3](P302)</sup>，野史实录舛误之处甚多，明史馆臣皆有同感。对野史实录如何看待，毛氏自有看法。野史多文饰，实录多曲笔，修明史偏重野史实录，毛氏是反对的，他主张实录、野史、家乘等诸多类史书应当相互比证、参校。毛氏居史馆中曾阉得正德年间大学士梁储一题，因尝读过有关梁储的诸多野史，爱其风采，敬其为人，视其为明臣之首，欲以“草制”、“齿剑”、“沮居守”、“斥

护卫”四大事为主干为其作传。毛氏遍查史书与实录,发现此四大事“悉属亡是,且不惟亡是而往往反是。如疏居守反曰沮居守,复护卫反曰斥护卫者尔”<sup>[1](P111)</sup>。毛氏好友同馆馆臣施闰章不解其“草梁储传与旧史乖反”,毛氏答曰:“所乖反者野史,非旧史也”<sup>[1](P111)</sup>,足见其对实录野史的可靠性是有疑虑的,不随意拿来修史。实录野史虽纰漏甚多,然,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只要去伪存真对修史也是有所裨益的,毛氏也看到了这一点。鉴于有关梁储的野史、实录失实之处甚多,毛氏“踟蹰再四”,欲不予立传,但考虑对其史事不可一概否定,决定“当于帝纪一存”,此事可见毛氏是辩证的看待和使用野史实录等诸多明史史料的。再如,毛氏所著《胜朝彤史拾遗记》,是以其父所藏的《宫闱纪闻》为底本的,因觉其“载事不确,文不雅驯”乃取外史与实录,结合修史余稿与《宫闱纪闻》相校参修。《武宗外纪》也曾大量采用了可信的实录野史。毛氏在《武宗外纪》序中曰<sup>[1](P1677)</sup>:

予观同馆之为史者,其为武宗纪,不忍斥言人主之过,凡实录所载诸可鉴事,皆轶而不录。夫史以垂鉴,不讳好恶,而乃以恶恶之短,而致本身所行事而皆轶之,是本也而外之矣。因题曰外纪。

毛氏辩证的裁择实录野史,影响了诸多清初史家的治史观,对清初史学建设也不无裨益。

其二,毛氏平素治学擅工考据,由考据入手治史学自当“必几许掇拾,几许考覈,而后乃运斤削墨,侥幸成文”<sup>[1](P211)</sup>。毛氏怀揣思念故国之情,不负史官之责任件件核实,事事求真,以期煌煌信史,垂之千载。毛氏曾草成《四川成都郫县知县赵嘉炜死事传》并已录史,上承史馆总裁,后考审相关诸书发现与原作有抵牾之处,本着治史求真的精神,毛氏上书史馆总裁官请求驳回原作。《史馆劄子》云<sup>[1](P110)</sup>:

遂于某日月草得四川成都郫县知县赵嘉炜死事一传,已经录史生写付收掌房,奉鉴在按久矣……但怪嘉炜本簿郫而死又在灌,且死事年月多不合。……忽有人自成都来,道其子麒与作通志者有旧,妄以簿为令而其死事所在与月日俱谬。因复查新修《成都府志》原载嘉炜系县簿守堰而投河以死,其状记所载月日仍参错不合,且或沈于江或射于堰皆不可定。切念崇禎之末记注未备而四川又丁草杀,之后民无孑遗,任所捏撰,无从批驳,倘不细为之稽核,则指白为黑终成诬史。……向于志铭中亦疑及之,而近核诸书究竟未合因先为检举,请驳原传以存疑阙……或当予以传略改成文具善长之意,或但从阙疑,暂悬其事以俟再考,总籍裁酌月日。

《史馆劄子》一文可显毛氏精细审慎,核实求真的治史精神,即使是一个小小县令的史迹,也要细细稽核,尤其反对捏造史实,痛恨颠倒黑白的诬史。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毛氏当时在史馆也是颇负盛名,况赵嘉炜一传已上呈备按,纵有新史料出现,毛氏也可完全不予理会,然毛氏本着史官的良知,求真的治史精神,不惜有损自身名声,执意上书请求驳回原作,以期留于后世以信史,这正是合格史家应有之本色,另外毛氏在札子末尾处还提出“阙疑”之说,“阙疑”自古就是史家治史求真的一种体现。前文提到毛氏曾草拟《梁储传》,当时著名学者同馆名臣朱彝尊问毛氏为何削去“梁储为秦府请地草敕一事”,彝尊认为“草敕”是件大事。毛氏经过考辨,认为时间不对,此事不真。《奉史馆总裁劄子》中,毛氏曰<sup>[1](P111)</sup>:

某敢削储事哉,顾储实无此事。即此事故有之,顾在嘉靖三年,武宗大行梁储去位之后,而以为储事冤呼?曰,有是哉不当慎耶。虽然盖辨诸迨于今相距八九年,实不知是传之取舍何等也。特念千秋信史所贵核实,故曰,不遗善,不讳恶。

核实千秋信史这正是毛氏毕生追求的治史信念与史学精神。毛氏有诗《初入史馆作》<sup>[1](P3149)</sup>为证：

昭代重文治，翘车递相因。圣教开中天，皎若星日陈。诏令下郡国，荐达如崔駰。  
策对赐著作，不止能亲民。所念胜国史，是非方未申。馆录既渐缺，册府亦已湮。  
因命合绳纂，众腋同补纫。载事在集意，辨误需求真。记疏陋欧宋，识龔诮向歆。  
尝恐大政略，要使陈编新。谁谓石室藏，便若海谷珍。代易少忌讳，辞一均见闻。  
野稗过苛激，翻足伤人伦。靖难诟圣祖，易嗣憎忠臣。几有秘阁裁，下与秽史邻。  
生平负末学，往欲追龙门。何幸绍前修，滥把拙匠斤。内府给笔札，下使供柴薪。  
当此委籍重，敢不删述勤。从来尚书善，所效惟获麟。如何紊褒讥，遗论徒千秋。

### 三、“弃虚蹈实”的治史风格

明末清初，宋明理学由盛入衰，诸多学者厌倦了主观冥想和空谈心性，主张尊孔读经，“重事功”，反对束书不观，崇尚实学、实证、实践，他们在各自的治学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推动着学风发生重大转轨，学术风气日益由“虚”趋向“实”，明学向清学转型已见端倪。从晚明开始，一直到乾嘉年间地近一百五十年中，弃‘虚’蹈‘实’是学风的一个总体发展趋势。这种学风的形成，滥觞于东林士子对理学的清算运动，这一运动在明亡清兴以后的清朝初年达到了高峰，乾嘉诸老即沿此余波而起形成了乾嘉考据学<sup>[4]</sup>。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毛奇龄是明代理学向清代朴学过渡转型时期标志性代表人物之一，在学风转轨的大背景之下，毛氏在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并推动了这股“弃虚蹈实”学风的兴起与发展。清中期著名学者阮元就对毛氏首开实学之功极为称道，阮元称<sup>[5]</sup>：

国朝经学盛兴，检讨（毛奇龄）首出于东林、蕺山空文讲学之余，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实学顿起。当是时，充宗（万斯大）起于浙东，黜明（胡渭）起于浙西，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起于江淮之间，检讨以博辨之才，俾倪一切，论不相下而道实相成。迄今学者日益昌明，大江南北著书授徒之家数十，视检讨而精合者固多，谓非检讨开始之功则不可。

康熙以降，清儒普遍重考订经史，正体现了理学的没落与实学的勃兴，标志着清代朴学时代即将到来。治史也是实学的一个重要层面。毛氏修正王学，攻驳朱学堪称理学清算运动中的“冲锋陷阵之猛将”<sup>[6]</sup>，其鄙夷宋儒习气、反朱学的思想延伸至治史必是“弃虚蹈实”。今观毛氏之史学风格，无不彰显弃“虚”蹈“实”的一面。

宋元诸儒好论史，不通读经史，便急于史断，这种束书不观、虚谈经史之风，延至晚明清初犹存，毛氏尤恶之，曰：“经学不明，不可与论史。生平最恨宋儒史断，与圣经大悖，急欲通论二十一史，而时不我与，将就木矣”<sup>[1](P208)</sup>。毛氏认为宋儒好论史，妄为“史断”，根源在于不读书，即不读经也不读史，或是不仔细读经史、不求甚解。毛氏曾曰：“是以读经多于经始可通经，读史多于史始可通史”；又言：“凡工虞礼乐必根抵六籍，佐以诸史，穷源而竟”<sup>[1](P599)</sup>。毛氏提出的观点，不仅提倡重视通读经史，而且认为经史之间是可以互动互补的，主张据经论史、“以经解经”<sup>[1](P583)</sup>、“以史证经”<sup>[7]</sup>，也只有这样才能免于理学家空谈经史的流弊，使史学研究弃“虚”蹈“实”。毛氏本人身体力行研经考史，潜心读书，并于晚年在其门人统编《西河合集》时，因不想蹈宋人史论结习以贻误后辈晚学，遂嘱托门人将其早年所作论史专著《史问》弃之不留存于

世。这正是其“弃虚蹈实”的史学学风的一种体现。

毛氏反程朱理学的思想发挥于治史的另一示例是极力反对明史馆立《道学传》。当时史馆总裁徐元文援引《宋史》体例分作《儒林传》与《道学传》，力主《明史》当立《道学传》，引起史馆内外众多史家的争论。《道学传》的立废，不仅是《明史》编纂体例的问题，其实质是理学内部朱学与王学之争，是清初理学清算运动的重要战役。《宋史》立《道学传》乃是彰显程朱理学之儒学正统地位，如《明史》仍立《道学传》则将置阳明学派于何地？况理学发展到后来多杂糅佛老二氏形上玄虚成分乃成道家之学于圣学有害，这引起了王学阵营的不满。其中以黄宗羲、毛奇龄为代表的王学大家极力主张废《道学传》，统立《儒林传》。毛氏作《辨圣学非道学文》<sup>[1](P1569-1571)</sup>曰：

圣学不明久矣。圣学以道为学，而学进于道，然不明道学。……道学者，虽曰以道为学，实道家之学也。……向在史馆，同馆官张烈倡言，阳明非道学，而予颇争之，谓道学异学，不宜有阳明，然阳明故儒也。……赖皇上圣明，直谕守仁之学过高有之，未尝与圣学有异同也。于是众论始定。予谓圣学之中，原该道学。……初学圣人只谓之学，学圣。既成，即谓之道。学者，道之始，道者，学之终，既非两途，又非两事，且并无两工夫。第从事于此，而学在是，道即在是焉。是以圣学圣道只在忠恕，……例圣学之该圣道，概可见矣。

毛氏认为朱学是道家之学，非儒学，乃异学尔，惟阳明故儒也。在以毛奇龄、黄宗羲等学术大家的抗争下，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徐氏兄弟最终放弃了设置《道学传》的打算。清初理学清算运动主要针对的是杂入理学当中的佛道两家的形上玄谈，毛氏主张于圣学中辟出老氏之“道”，是属于理学清算运动“辟佛老二氏”重要的一面。毛氏虽坚守王学，但对王门后学流于狂禅，极为不满，指称阳明后学虚妄，力辨阳明非禅。毛氏于其重新修订的《王文成传本》中考辨阳明弟子们记述，纠正标榜附会之事、剔除阳明遇仙遇佛之妄言，这也正是其“弃虚蹈实”治史之风的一种体现。

杜维运曾这样说过：“清初学术，就史学一项而言，最值注意者，为经世思想与科学精神作其灵魂。史学所争者为真理，史家须寓于实事求是，是之科学精神，然后史学之价值始显”<sup>[2](P236-237)</sup>。所谓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正是清初实学的实质，也是清初史学的灵魂。清学又称朴学或考据学，考据是明学通向清学的主要津筏，考据也就是辨伪求真，实事求是。毛奇龄乃清初考据大家，清代汉学的先驱，以考据治史学，辨析史料之真伪，剔除于史学有害之文饰之言，调停之说，求信史以真、还史学以实，求真求实本身就是经世致用，此正与清初史学“弃虚蹈实”之风暗合。

#### 四、余 论

综而论之，毛奇龄是清代学术史颇受争议的人物。中国近三百年以来，有批评其大节有亏，操持不佳者；有指责其学风粗枝大叶，著述成论舛误甚多者；有诟病其“治经怪异”、治学路径不清、学术归属不详者。毛氏人品姑且暂论，而就批评其学风与学术成就问题，颇值得商榷。毛氏好强辩，难免言论不当、考据有失，然而瑕不掩瑜，观者当谅之。

抛开考辨群经的丰硕成果不谈，就史学成就一项而言，毛奇龄就足可留名于青史。邵廷采标榜毛氏为“今世之韩、欧、班、马也”<sup>[8]</sup>，虽称颂过之，但毛氏之清初史学大家地位不容置疑，而晚清李慈铭称“西河史学实疏”<sup>[9]</sup>，未免有失公允。毛氏之学源出王、刘，又经史皆显，这与

肇始于梨洲以博稽经史见长的清代浙东学派甚为相似，而从学术的造诣与贡献来看，原本就属于浙东这一地区的毛氏，其贡献绝不在黄梨洲以下，钱穆也称毛氏“伸王抑朱，于姚江、蕺山浙东一脉，不得谓全无地位”<sup>[10]</sup>。因此，将毛氏归入清代浙东一派是顺理成章之事。梁任公对清代浙东学派史学成就极为称道，然却视毛氏不见，认为其治史“著述专务内容之繁博以炫流俗，而事实正确之审查不甚厝意”<sup>[3](P298)</sup>，任公的看法值得探讨。简言之，凭藉其史学贡献，毛氏在清代史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 参考文献

- [1] 毛奇龄. 西河文集[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 [2] 杜维运. 清代史学与史家[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3]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5.
- [4] 路新生. 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10.
- [5] 阮元. 擘经室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543.
- [6]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145.
- [7] 毛奇龄. 四书改错[A]. 见: 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 续修四库全书(第 165 册) [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1-228.
- [8] 邵廷采. 思复堂文集[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 310.
- [9] 李慈铭. 越缦堂文集[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5. 197.
- [10] 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261.

## Mao Qiling's Spirit of History and Researching Style of History

ZHANG He

(History Depart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62)

**Abstract:** Mao Qiling was a controversial famous scholar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He was not only good at Confucianism but also attached importance to history. He took part in compiling History of Ming and wrote out abundant historical works; he emphasized the 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which shows his spirit of seeking verity of history. Moreover he unsealed the vogue of dealing with history practically in early Qing. So Mao Qiling should have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study of Qing history.

**Key words:** Mao Qiling; Early Qing's historical study; Spirit of history; Vogue of history

(编辑: 刘慧青)